

高日明王通撰佚

高日明王通撰



994
80
15

高昌壁画辑佚

孟凡人题



孟凡人 赵以雄 耿玉琨 编绘
吐鲁番地区文物中心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祁协玉

封面设计：刘培勤

题头字：任芳琴

题头画：曾多源

1998.4.5
文物出版社
门市部
No. 3295464

高昌壁画辑佚

孟凡人 赵以雄 耿玉琨 编绘
吐鲁番地区文物中心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地矿局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474千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ISBN7-228-03248-9/J·156 定价:65.00元

序 言

常任侠

新疆吐鲁番盆地，古代名为高昌。自从汉代丝绸之路，通向西方世界，这里遂成为冲要之地。在公元前60年，汉代将阻塞这一通路的匈奴击破，设屯田校尉，开发生产，巩固这一交通路线，从而加速了该地区古代文明的发展，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同时引进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成了著名的大事件。高昌亦因此永存史册。

交河古城，是古高昌的治所，如今只剩一片颓垣残壁，街道寺宇，都已破坏，成为荒凉的废墟。但它在两河之间，因以交河得名。有水就有植物生长，所以至今仍是居民殖生长养的地方。不远就是著名的葡萄沟所在。自古流传下来的佳果名品，累累果实，香味四溢，依然是四方来游者的胜地。回思其过去的盛况，是可以从其遗留的艺术珍品得到印证的。

高昌，在汉元帝时（公元前48年）改屯田校尉为戊己校尉，设治所于高昌壁，因以得名。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废戊己校尉设高昌郡，治所亦易名高昌城。由沮渠氏承平元年（公元443年）至麹氏延寿十七年（公元640年）这二百年中的统治者，历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麹氏，先后在此建高昌国，皆设治所于高昌城。公元450年，沮渠氏曾破车师，车师王率其部分臣民，逃于焉耆，吐鲁番盆地尽归高昌统治。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灭麹氏，取高昌，又以高昌城为西州，统治吐鲁番盆地。此后唐贞元中（公元719年），吐蕃强盛，攻陷西州。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又自北庭取西州，立国于高昌，是为维族执政之始。至蒙古族兴起，公元1209年，回鹘臣属于成吉思汗。1283年，元朝强令回鹘王族东迁甘肃永昌，1324年高昌归于蒙古族察合台汗国，1370年察合台汗国亡，高昌故地又分裂为吐鲁番王国，及火州、柳城等地面。至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吐鲁番渐强，统一整个盆地，又兼并哈密，扩张势力于瓜州、沙州、肃州、凉州；至明代以前，它的历史演变，大致如此。经过了一千余年，它的民族迁移，宗教信仰、文化发展、艺术风格，都有了不同的变化和丰

富的遗存。流传今日的这些珍贵的古艺术品，正是历史形象的记录，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份文化遗产，永远使我们珍爱。

但是在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觊觎吾国疆土，以探查考古为名，纷来新疆，盗窃文物，收集地图资料，为军事侵略的前驱。因此吾国洞窟壁画、古墓藏宝，被其擅自割裂剥劫公然掘取以去者，不知凡几。散在海外各国，迄今不还。其中有明屋壁画、墓葬绢画、砖画、明器、陶、铜、玉、石等古物，不可胜数。我国艺术、考古、历史学者，欲得一完整资料，加以研究，收求颇不容易。过去国外所印行的这一类著作，值昂更不易得。今孟凡人、赵以雄、耿玉琨三同志，同心协力，发愿把新疆的古代绘画散失国外者，一一收集绘编刊印，精心摹绘，已穷数年之力，首先完成的《高昌壁画辑佚》就是其成果之一。这个工作是切实的，难能可贵的，若果没有经过很好的基础训练，也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赵以雄、耿玉琨两位中年画家，他们数度前往新疆，实地探查写生，不畏困难，表现了坚毅的精神，曾刊印过两种新疆画集，留下了大漠行迹的脚印。这本《高昌壁画辑佚》的成就，正是在此基础上，为新疆古文化的保存，做出一大贡献。

高昌壁画的内容，延续了好多世纪。其中以宗教画为主，有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伊斯兰教不主张造像，只在新疆留下不少建筑艺术。墓葬画多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距高昌故城西北二点五公里，为高昌郡至唐代汉族上层的墓葬，范围颇大。出土绘画资料颇多，有绢帛画和墓壁画，并出有墓志和古文书，可以考定年代。其中绘有汉族风俗人物、神话及历史故事，为汉族文化的传播，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文化交融，作出了不少贡献。如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古老神话，作为始祖保护神，已传入了西部边疆。其他汉文的经典与记录生产的文书，都有出土，其价值正可为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出时代的考证。

高昌画以宗教画为主，宗教画又以佛教为主。其中所绘佛本生故事，往往为它处所无。今天的新疆，则以伊斯兰教遍于各地，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的变迁之大了。

目 录

高昌壁画述略	孟凡人 (1)
--------------	---------

高昌壁画辑佚图录	临 绘 赵以雄、耿玉琨 (31)
	说 明 孟凡人

一. 高昌古城与交河古城的绘画	(32)
-----------------------	------

高昌古城	(33)
------------	------

交河古城	(96)
------------	------

吐鲁番前山及其附近	(105)
-----------------	-------

二. 伯孜克里克的绘画	(108)
-------------------	-------

三. 胜金口与吐峪沟的绘画	(208)
---------------------	-------

胜金口	(209)
-----------	-------

吐峪沟	(236)
-----------	-------

四. 阿斯塔那墓地的绘画	(263)
--------------------	-------

插 图	(272)
-----------	-------

高昌壁画辑佚后记

——浅谈高昌壁画的艺术特点	赵以雄 (285)
---------------------	-----------

高昌壁画述略

孟凡人

本书名称《高昌壁画辑佚》，通俗言之，即是将吐鲁番盆地古代壁画及有关的各种绘画资料已散失国外者收集成册。关于这项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内涵，专家学者们虽然早已熟知，但是一般的广大读者恐怕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有必要简单谈谈与高昌壁画有关的一些问题，以供同志们参考。

一 高昌壁画的内涵与佛教遗迹

（一）吐鲁番古称高昌

新疆吐鲁番盆地在汉通西域之前，姑师（后改称车师）于此立国，王都设在今交河古城。汉通西域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战败匈奴，击破姑师，遂于其地设屯田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改屯田校尉为戊己校尉，治所设在高昌壁。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废戊己校尉设高昌郡，治所亦随之易名高昌城。沮渠氏承平元年（公元443年）迄麹氏延寿十七年（公元640年），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麹氏先后在此建高昌国，都城均设在高昌城。其间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沮渠无讳破车师，车师王舍国率部分臣民逃奔焉耆，吐鲁番盆地遂完全置于高昌国控制之下。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灭麹氏高昌国，又以高昌城为西州和高昌县治统治吐鲁番盆地。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左右，吐蕃攻陷西州。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自北庭取西州，立国于高昌城，史称高昌或西州回鹘王国。蒙古兴起后，公元1209年回鹘臣附成吉思汗，公元1283年元朝强迫高昌回鹘王室东迁甘肃永昌，公元1324年高昌回鹘王国地入察合台汗国笃来帖木儿。公元1370年察合台汗国亡，原高昌回鹘地域内又分裂为吐鲁番王国以及火州、柳城等地面。十五世纪中期以后，吐鲁番渐强，除占有整个盆地外，还向外并哈密、垦瓜、沙，侵肃州，掠凉州。嘉峪关外，几尽为所有，以迄明季。综上所述，明显可见从汉至回鹘时期，吐鲁番盆地一直称为高昌。历代统治中心或称高昌壁或称高昌城，其间除城的形制和规模各不相同外，位置始终未变。因此，现在一般多习惯将这个时期的吐鲁番盆地称为高昌地区。

高昌地区“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饶漆”，“出赤盐”，产良马，织白叠为布，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加之地处东西交通要冲，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致使高昌地区成为新疆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特别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在高昌历史的长河中，汉族和当地各族人民命运相依，以艰辛的劳动共同开发高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其中凝聚着各族人民智慧，融合了东西文化交流成果的绘画艺术，便是高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高昌画的主要内涵

现在所能见到的高昌画，以高昌回鹘时期的为主，其次是唐代，少数画可能早到高昌国或高昌郡时期。这些绘画资料，数量很大，内涵比较复杂。若以性质来分，有佛教画、摩尼教画、景教画，墓葬画和少量的世俗画。其中墓葬画，主要出于阿斯塔那墓地。该墓地在高昌古城西北约2.5公里，从阿斯塔那村北一直延伸至山麓地带，东西宽约一公里，范围很大。这里埋葬的主要是高昌郡至唐代汉族达官豪族之流，故出土绘画资料较多。再者若以绘画所采用的质料来分，则有壁画、绢（帛）画、麻布画、纸画和板画（画在木板上）等数种；以壁画占的比例最大。从绘画的题材来看，又因各类画的性质不同而各异。如景教画，题材多与基督、使徒有关，画面一般绘有十字架，色调偏冷。摩尼教绘画，题材多以摩尼和僧众为主题，或绘与摩尼教仪轨有关的题材。所绘人物大都白衣白冠，经典中的插图则使用金、银、红、绿等色，绚丽夺目。墓葬画题材比较广泛，一般以墓主人生前生活图像为主，此外还有人首蛇身图（伏羲女娲图）等等，用色不拘一格。佛教壁画题材非常复杂，举其要者大致有各种净土变、涅槃变、药师变、法华经变、地狱变、密教诸题材画，成组的供养画、说法图、佛本生和佛经故事、千佛像、四天王像、供养人和供养比丘像、供养菩萨行列、以及各种图案和装饰花纹等等。总的来看，高昌佛教壁画虽然时代和题材不同，但是它们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比如每窟或每座殿，大都以一个题材为中心，并配列近似或有关题材的壁画，相辅相成，有整体感。各类壁画位置大致有定，中心题材壁画多绘在塑像主尊周围的壁上；说法图多绘在坛或塔的正面；经变画和佛经故事多绘在室内两侧壁和后壁；供养画除画在室内两侧壁和后壁外，有时也绘在甬道和隧道两侧壁上；千佛像一般绘在窟顶或坛塔的四隅；天王像大都位于室内四隅；供养人像或供养比丘像，主要绘在门口或甬道口或说法图两侧或坛塔侧缘等等。同类壁画构图形式基本一致，如供养画

都是以立佛为中心，两侧分绘王、婆罗门、菩萨、比丘、天部、执金刚，寺院等等。经变画主图在中间，两侧缘和下缘用连环画形式分绘与主图相关的佛教故事。说法图均以佛说法像为主，两旁绘菩萨、比丘等，两侧缘绘供养人或供养比丘。佛本生故事多以连环画形式分图绘出。密教图像，主尊在中央，两侧及下部绘诸眷属。千佛像大都以长方格为区划，成排成组绘出千佛坐像。绢画构图形式与壁画基本相同。麻布幡画，一幅一个主题，或绘佛，或绘菩萨，或绘天王，或绘供养人。有的幡画在顶端还绘小化佛，主像两侧绘供养小像等。这些佛教画多有榜题，有的画面上还绘出书写榜题的栏框。佛教画绘制技法，大同小异。以壁画为例，壁画都用细草泥和白粉皮制作壁面，绘画以铁线描为主，轮廓线多用墨线，也有用黑红二重轮廓线的。在设色上，平涂、勾填和渲染法并用；色调偏暖，主色多用红色，辅色则用绿、浅红、兰、黑、白、黄等色。壁画各部位“随类赋彩”，色泽富丽和谐。

除上所述，还有一些方面，如佛教画所反映的信仰问题，及其与外界的关系等等也属于内涵的范畴。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拟列专节论述。

（三）佛教画是高昌画的主流

如前所说，现在能见到的高昌画，除极少部分外几乎都是宗教画。由此可见，高昌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是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的。大家知道，高昌是多种宗教流行区，主要的有祆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佛教等等。祆教即巴克特利亚创立之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南北朝至唐代时流行于高昌地区。道教主要流行在高昌的汉族之中，它和祆教与高昌的绘画艺术关系不大。景教即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派，传到中国后称为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四年（公元635年）大秦人阿罗本将景教传入中国。景教传入高昌，一般认为比此略早，并一直延续至元代。由于高昌地区信奉景教者少，故其遗留的绘画资料也极为有限。摩尼教，系波斯萨珊王朝初期摩尼所创（约生于公元240年）。该教是融合了祆教、基督教和佛教教义而成的一种新宗教，它于唐代传入高昌，但未普遍流行。自信奉摩尼教的回鹘族入主高昌，摩尼教一跃成为国教，盛极一时。在回鹘族皈依佛教后，摩尼教又延续了很长的时间。由于摩尼本人是位画家，故摩尼教非常注重绘画，其仪规中明确规定寺院里设置经图堂。所以在高昌摩尼教寺院中，发现很多摩尼教绘画。但是，无论摩尼教还是景教绘画，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和佛教画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佛教画乃是高昌画的主流，一部高昌绘画史实际上主要是佛教绘画史。因此，下面着重谈谈高昌佛教流行的时间、盛况及其与绘画的关系问题。

佛教传入高昌晚于天山以南地区，具体年代无确考。据考古资料，在吐峪沟石窟寺曾发现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残件；高昌古城“可汗堡”东南M寺出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沮渠安周造寺碑。阎文儒先生所著《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7·8期）一文认为，吐峪沟东岸西北区的2、3、4三个窟开创于晋设高昌郡以前；东南区4号窟及雅尔湖早期石窟则开凿于高昌郡时代。从文献资料看来，《出三藏记集》卷八记载，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第（《晋书》称弥寔）朝苻秦，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献梵本《大般若经》一部。同书卷二记载：“《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高昌郡沙门释法众所译出。”又记蒙逊之从弟沮渠京声于高昌郡自译《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经》各一卷。上述情况表明，佛教正式传入高昌地区可能在三世纪后半叶左右；到四世纪佛教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是时它甚至成为车师的国教；五世纪时高昌郡的统治者还直接参与了倡导佛教的活动。虽然如此，但是高昌地区所出各类世俗文书里，反映这个时期与佛教有关的资料却绝无仅有，可见迟至高昌郡时期佛教并未广泛深入到高昌社会之中。

高昌国时期，各代的统治者大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以佛教作为麻痹统治人民的工具，大力倡导，佛教发展较为迅速。即使这样，《魏书》记载麴嘉时高昌国仍然是“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大致到麴坚前后，高昌佛教才始入盛期。与此相应，各类世俗文书中反映与佛教有关的情况也逐渐增多。以佛寺为例，麴氏时期王和王室成员，贵族大姓和官员等争先在高昌城内外造寺。仅文物出版社《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中所录，就有太后寺，永安公主寺；阚、张、马、麴、索、等大姓诸寺，大小官员诸寺共六、七十处以上；此外还有众多平民建造的小寺。公元1911年在阿斯塔那曾发现折冲将军、新兴县令麴斌于延昌十五年（公元575年）立的造寺碑。据碑文记载，寺建于新兴城西，为寺施舍地产七处，其中仅泽一项即为四十亩；另外在新兴城内还施房产一区。碑文末署名者，上至高昌王麴宝茂及世子乾固，下至大小官员三十二人，真是隆重之至。到麴文泰时佛教更为昌盛，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高昌传》记载，玄奘行至伊吾，文泰使人专请，与妻子彻夜不眠，“读经敬待”，及玄奘夜至，列烛迎接。文泰对玄奘说：“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

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入皆为师弟子，望师讲受，僧徒虽少，亦有数千……”。玄奘讲经，“王别张大帐”，“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已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蹶上。日日如此。”玄奘出发西行，王备厚礼，并“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已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上述情况表明，当时高昌国君民笃信佛教已到何等程度。

唐代西州时期，佛教在麹氏高昌的基础上继续繁荣，文书中记载佛寺的数量较麹氏时期有增无减，香火仍然很盛。唐末回鹘在高昌立国后，摩尼教虽然一度成为国教，但佛教在原土著居民中盛况不衰。这样客观上又促使回鹘族改奉佛教，关于回鹘族皈依佛教的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论。据《宋史·高昌传》记载，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公元965年高昌王便“遣僧法渊献佛牙等”。胜金口发现的木柱刻文记载，公元938年前后回鹘王子曾在此建寺。吐峪沟石窟寺出土的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的时代约在九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世纪初左右。

《高昌契氏家传》记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事，因为梵言以祝之也”（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一），唐赐此印显然应在公元907年唐亡之前。此外，一些回鹘文佛经，如《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似始译于中唐以后不久；《金光明最胜王经》始译于唐代晚期或后唐（公元923——935年）。根据上述诸点，以及安史乱后高昌地区“颇有回鹘”（《宋史·高昌传》）等情况判断，似回鹘族中已有部分人先期皈依佛教。但是，由于回鹘族在公元866年前后才入主高昌立国，并一度信奉摩尼教，故其正式皈依佛教即以佛教为国教则应在九世纪晚期至十世纪初左右。此后，高昌佛教开始步入鼎盛时期。据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王延德《使高昌行记》中记载，高昌城“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除这些前代佛寺外，回鹘还大兴土木，兴建新寺和开凿石窟。这种盛况直到蒙古势力控制今新疆地区，公元1283年高昌回鹘王室被迫东迁甘肃永昌，才逐渐衰落下去。公元1383年秃黑帖木儿之子黑的儿火者任别失八里的察合台汗，开始对高昌地区进行“圣战”，强迫高昌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并将高昌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高昌佛教虽然惨遭此种劫难，但因其根深蒂固，仍然苟延了较长的时间。大约到十五世纪中叶左右，高昌佛教才最终为伊斯兰教所取代。

综上所述，高昌佛教前后延续千余年，深深地渗透到高昌社会机体之中。由于佛教非常崇拜偶像，并把制作偶像看成是积善行、作功德；所以广大的善男信女，上自王室、下到百姓无不争先为之。在这种情况下，高昌几乎可以整个社会力量为后盾，大量建造佛寺，开凿石窟，集中本地及外界一些优秀画师塑匠，不断地雕塑佛像，绘制佛画。其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延续时间之长，是当地其它宗教艺术和世俗艺术无法比拟的。

（四）佛教遗迹是高昌画的宝库

佛教绘画，几乎全部存在于佛寺和石窟寺之中。摩尼教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两者有时甚至共用一座寺院。特别是回鹘皈依佛教后，很多摩尼教寺院以至景教寺院都被改建成佛寺。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佛教画，摩尼教画及景教画均出于佛教遗迹，故佛教遗迹堪称高昌绘画艺术的宝库。因此，下面拟对一些重要佛教遗迹的情况略作些介绍（插图2）。

1 高昌古城内的佛教遗迹

高昌古城，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央平原，建在哈喇和卓绿洲，处于二堡（哈喇和卓）与三堡（阿斯塔那）中间，西距今吐鲁番县城约50公里。这座古城现在残存遗迹已经不多，但本世纪初德国人来此调查时却遗迹密布，仅编号的重要遗迹就达七十处以上。其中除“可汗堡”等政治性建筑遗迹外，余者绝大部分均属佛教寺院遗迹。这就清楚地表明，高昌城不仅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盆地内的宗教中心。

高昌古城分为内外两城，外城略呈不规则方形，内城南北长方形，大致在外城的中间。古城内佛寺及出土佛教遗物的建筑较多，下面择要略举几例。1

“可汗堡”，内城中间偏北的堡垒式建筑，俗称“可汗堡”。堡外有不规则椭圆形的夯土围墙，周长约700余米。堡内西北高台基上立土坯塔，残高约15米；塔之周围残存有殿址等建筑遗迹（插图1E；3）。“可汗堡”是回鹘王宫所在地，同时前代统治中心亦大致在这个位置。这里出有回鹘时期、唐代或更早一些的佛教绘画。“可汗堡”之外，东南有M寺（插图1），出有承平三年沮渠安周造寺碑。西边从北向南有φ、x、λ、ν、S、δ、n、Q、R、S等佛寺遗址；南边有W佛寺遗址；北边有A、B、C、D、G等佛寺遗址（插图1）。这些佛寺遗址，大都出有佛画和佛教遗物。2K寺院遗址（插图1、K；3之1），

在“可汗堡”南偏东，大致位于内城的中心，是内城中仅次于“可汗堡”的重要建筑。**K**寺院遗址原是一座摩尼教寺院，后改建为佛寺。遗址是由很多房间合成的一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残存平面呈凸字形。本世纪初德国人来此调查时，发现有些小室还残存圆顶，在一间房子里堆积着上百具佛教僧侣的尸体，有的头盖骨还残留刀痕。在一个有圆顶的小屋内，堆放着大量的摩尼教经典和绘画，勒柯克美其名曰“图书馆”，或曰“藏书室”。此外，该遗址内还发现很多回鹘时期的佛教绘画和其它佛教遗物。由于**K**寺院地处内城中心，发现的摩尼教和佛教绘画非常精美，供养人像规格很高，估计它应是回鹘时期兴建的王家寺院。在**K**寺院附近，东南有 φ 、 φ' ；西有**X**以及 τ 、**S**、**e**、 π 、**I**等佛寺遗址（插图1）。靠内城西城墙附近有以**N**、 μ 、 γ 为代表的寺院遗址群；内城南城墙西端 γ 寺嵌在城墙内（插图1）。这些佛寺遗址，均出有佛画或佛教遗物。3 α 寺院遗址，位于内城西南，嵌在内城西城墙中（插图1、3）。出有唐代和回鹘时期的佛画和遗物，以及摩尼教画等。其中一件回鹘文本柱刻文记载，约在十世纪末左右，回鹘曾对 α 寺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工程，即现存遗迹是在唐寺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由于 α 寺所出供养人像规格较高，木柱刻文中又有向王族显贵们祝福的词句，故 α 寺亦应属王家寺院的性质。4 **Z**寺院遗址，位于外城东南角，残存有殿和塔（插图1）。殿横长方形，后壁设五个台座，殿后与塔相连，塔平面呈亚字形，塔身棱状柱形，有小佛龕。出有回鹘时期佛画和佛教遗物。此外，在**Z**寺之西，西北还有些寺院遗址。5 **Y**寺院遗址，位于外城东城墙中部折拐处之西，残存一座佛塔（插图1）。塔有方形塔基，上立方柱形塔身，塔身残存三层，每层均配列类似石窟寺洞窟的大佛龕，龕内置佛教塑像并绘制佛画。**Y**塔可能始建于唐，延用至回鹘时期。此外，在**Y**寺之西，紧邻内城东城墙有 λ 寺；**Y**寺之东，位于外城东城墙折拐处有 ω 寺；**Y**寺之北是以**U**、**T**、**T'**、**I**、**I'**、**V**为代表的寺院遗址群（插图1）。上述寺院始建时间，似在回鹘时期以前。6 β 寺院遗址群，位于外城西南角。中心建筑是西边中间的寺院遗址，平面东西长方形，规模较大（插图1、3）。寺院后部中间有佛塔，塔前与佛殿相连。寺院南北两侧基本对称排列十四幢长条形小屋；寺院西端南北排列东西长条形小屋；寺院塔殿之东与东边门道中间，南北两侧基本对称排列长条形及长方形房址。佛寺内出有回鹘时期的佛画和佛教遗物。在 β 寺之北，有 γ 寺，残存一座高塔；该寺之北略位于外城西南部有**P**寺，残存一组塔群（插图1）；均出有回鹘时期佛教遗物。

除上所述，在高昌城东城外之东，桥南干河之北还有两座佛寺遗址（插图1）。佛寺残墙均两重，内壁是后砌的，绘佛教壁画；外壁是老墙，绘景教壁画。此外，高昌城附近如阿斯塔那等处还有些佛寺遗址，因与本文无关，故不赘述。

2 交河城与雅尔湖石窟寺

交河城在吐鲁番县城西10公里，位于雅尔乃孜沟村干河床中的土崖上（插图5）。土崖南北长约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该城原是车师前部王治，其后历代均为仅次于高昌城的重镇，同时也是一座巨大的佛教中心。古城遗址集中于土崖的中部和南部，建筑范围南北长约1000米。古城以中间大道为界，似可分为三区。大道东侧北部为街巷纵横的居民区；大道南及道东侧南部为第二区，残存建筑遗迹较少，居住址多为窑洞形式。在该区大道东侧南部有大宅院，附近地面很高，宅院有厚土围墙。院内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建筑形制比较复杂，估计当为交河城统治者的驻地。第三区在大道以北和以西，建筑面积较前两区大，约四万平方米左右。残存建筑几乎全部是佛寺遗址，平面多数呈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其中以城内大道北端寺院遗址最宏伟，也是城内最大的建筑。寺院遗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约88米，宽约59米，形制与高昌城β寺有些近似。另一座寺院在土崖南部偏东，残存一处塔群，形制与高昌城P塔群相近。此外，在上述两佛寺之间，还残存着一些寺院遗址。交河城佛画绝大部分发现于寺院区内，时代主要有唐和回鹘两个时期。

雅尔湖石窟，在交河古城西南约1.5公里，位于交河水南岸的半山腰中，残存七个洞窟（插图4）。其中第五窟西壁，有新疆各石窟中仅存的突厥文题记。从残存壁画来看，似始凿于高昌郡时期，并延用至回鹘时期。如第七窟窟顶绘莲花、竹笋形天雨花、水鸟、鳙、螺等；四壁绘通肩式大衣与双领下垂式大衣的千佛，风格与克孜尔石窟二、三期壁画相同。第四号窟千佛像与伯孜克里克回鹘时期千佛像形制相同，天部形像又与敦煌五代，宋初十王和供养人的形象相同，应属回鹘时期。

3 胜金口寺院遗址

胜金口寺院遗址，在木头沟水出火焰山口的东岸上，本世纪初残存有十二处寺院遗址，现在只剩下山腰两处（即插图8之6、10），山脚下两处（即插

图8之1、2)。关于修建胜金口寺院，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鞠斌造寺碑记载“于新兴县城西造立一寺”，并说寺“南枕谷”，与“北泽”，“秦城泽”及“卜家潢”等为邻。鞠氏新兴县即在今胜金口一带，造寺碑则发现于阿斯塔那，因此所谓新兴城西很可能处于胜金口与阿斯塔那之间。《辛卯侍行记》卷六记载，森尼木“一称僧吉木，回云潮湿地也，今讹为胜金台”。又说胜金口北有河滩宽六、七丈，多芦苇；胜金口废庙附近“山涧水贯其中，疾流不冰”，“自胜金口西行平旷”。可见在新兴县西与阿斯塔那之间，只有今胜金口寺院遗址附近才有“谷”和较大水面的条件。另据《西州图经残卷》记载，在前庭县（即高昌县）界北山20里宁戎谷有寺一所。日本大谷文书一二二八、二九一三号等记高昌“城北二十里新兴”；二八五五、二九一四号等记高昌“城北二十里新兴屯亭”；三三七七号文书记高昌城北二十里新兴宁戎吉具谷；一五一六号文书记“宁戎乡周祝子”；桔瑞超文书记“户周祝子一段两亩常田城北新兴”。上述资料互证，表明新兴与宁戎同在高昌城北二十里，两者毗邻。而在这个地域内，仅今胜金口才有寺院遗址群。因此，鞠斌所造之寺，唐代的宁戎谷寺，可能即是指今胜金口寺院遗址群中某一寺院而言。二是本世纪初勒柯克在胜金口寺院遗址发现一件汉文本柱刻文，共十八行。文中记有“兑利耶嘘地密施天特银”，“天公主居耶密施登林”，“见支都信登林”，“兑利焉密施郎君”，“见支焉密施郎君”等“敬造新兴谷口南胜崖嶧福德之处”。所谓“天特银”即王子、“天公主”为王子之妻，余者则是他们的子女。木柱刻文的时代，约在公元938年左右。以此证之，胜金口寺院到回鹘时期又继续修建，并为王家寺院之一。

胜金口寺院遗址约有两种主要形制，一是就石崖用土坯砌出横卷顶或纵卷顶的支提窟或毗诃罗窟，两边土坯砌成木建筑式的僧房，前面有寺院围墙。现在山腰残存的二处寺院遗址，即属此种形制。另一种建在山脚下平地上，全部用土坯建筑，有长方形围墙，大殿在院内中后部，有两重平面，殿内形成甬道和隧道；沿院墙两侧建有寮房（插图6、15）。胜金口寺院遗址发现有唐代和回鹘时期佛画，以及摩尼教画等。胜金口寺院遗址由于延续时间较长，遗迹和佛画资料较多，因此，它在研究高昌地区佛寺或石窟寺平面形制的演变，佛画的发展序列方面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4 伯孜克里克石窟寺

伯孜克里克石窟寺在吐鲁番县城东北约50公里，距木头沟村约2.5公里，石